

外交风云录

(续 篇)

〔苏〕瓦·米·别列日柯夫 著

李文厚 高 陶 孔松林 赵慧如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В. М. БЕРЕЖКОВ

ПУТЬ К ПОТСДАМ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9

根据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外交风云录

(续篇)

〔苏〕瓦·米·别列日柯夫 著
李文厚 高 陶 孔松林 赵慧如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6.25 字数：159,000
1982 年 1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3003·1648 定价：0.68元

目 录

第一章 迎来1944年	1
第二章 贯彻德黑兰决议	6
重返莫斯科	6
在阿弗里尔·哈里曼的官邸	8
艾森豪威尔出任总司令	12
丘吉尔的幕后活动	14
意大利舰队问题	18
关于波兰的辩论	23
根本转折	26
第三章 复杂的盟国关系	31
军事计划	31
伦敦的疑虑	34
美英两国的特殊联系	35
在国界之外	39
克里姆林宫的舌战	42
第四章 胜利在望	46
华沙起义	46
命运的转折	53
美国人对形势的分析	60
丘吉尔的焦虑不安	64
两巨头会谈	67
访问的成果	74
“三巨头”再次会晤的前夕	78

第五章 雅尔塔会议	89
赞成与反对	89
预备性晤谈	92
有关德国前途的争论	96
战后世界的设想	99
不列颠的遗产	103
波兰边界协议	107
远东事务	112
平等关系的榜样	115
第六章 从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之间的形势	118
在柏林方面	118
伯尔尼事件	122
罗斯福之死	130
白宫交锋	134
胜利日	141
哈里·霍普金斯的使命	145
最后的准备工作	152
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柏林	156
第七章 波茨坦会议	160
斯大林会见杜鲁门	160
形势的特点	162
会议第一天	169
原子讹诈	173
会外交谈	177
1945年还是1937年	182
杜鲁门进攻的失败	184
继续辩论	192
“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的激烈争论	194

第一章 迎来1944年

1943年的最后一个月，莫斯科呈现出一派令人振奋的气氛。人们感到欢欣鼓舞是有不少原因的。尽管绵亘北冰洋和黑海之间的广阔无垠的苏德战线各个战场上依然进行着鏖战，但苏联人最后战胜敌人的信心在与日俱增。大家都知道，为使苏维埃国土免遭侵略者的蹂躏，为使处于纳粹分子奴役之下的欧洲各民族得到解放，今后还需作出巨大的努力；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红军正在势不可挡地继续向西挺进，战争的主动权已经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这大大激发了苏联官兵和在后方操劳的人们的旺盛斗志。

我们的盟军正在作战的战场上，也不断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盟军在意大利、阿拉曼、突尼斯地区和其他战场的胜利表明，在那边，决定战争命运的也不再是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了。

刚刚结束的三大国领导人——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德黑兰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显示了三大盟国决心团结一致缩短战争时间，并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德黑兰会议深得人心，它激励着热爱自由的各国人民去建立新的功勋。三大国的宣言指出：“我们就从东、西、南三方面将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在陆地上消灭德国的军队，在海上消灭德国的潜艇和从空中消灭德国的军工厂。

“我们将无情地、日益猛烈地进攻……”

“我们表示决心，我们三国在战时以及战后的和平时期，都将共同合作……我们满怀希望和决心而来，我们作为志同道合的

真正朋友而离去。”这就是“三巨头”当时对他们达成的决议之实质所作的评价。

爱好自由的人类，首先是苏、美、英三国的人民高度评价德黑兰会晤取得的成果。苏联政府首脑回到莫斯科后，收到美国总统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说：“我认为会议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深信它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它不仅证明我们完全能够在一起作战，而且也能在极为融洽的气氛中为未来的和平而工作。”12月6日，斯大林对此作了回复。他写道：“我同意说德黑兰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之间的个人会晤在许多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我们几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不久将感到这点。可以肯定，我们的人民在目前以及在战后都将协调地合作。”

德黑兰会议的成果，可以看作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实际运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合作原则的具体体现。莫斯科一贯强调把这种合作经验推广到战后时期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创造条件，以便在未来的和平年代能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其基础就是1917年苏维埃共和国在著名的“和平法令”中宣布的列宁关于公正的、民主的和平思想。

当时的形势不允许贯彻这一思想。现在，德黑兰会晤之后，西方大国已表示愿意这样做，因此，把和平共处原则作为苏联同资本主义各大国——反希特勒同盟的参加国——之间关系的基础，已具有相当现实的可能。

因此，美国总统于1943年12月3日，即他离开伊朗首都两天之后，自开罗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对德黑兰会晤所作的评价，是耐人寻味的：“我对我们聚会的那些重要日子极为满意，认为这是人类进步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客套话。总统的挚友、参加“三巨头”会晤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哈里·霍普金斯在笔记中证实，罗斯福离开德黑兰时深信，“在维护战后和平事业中同俄国合作”是可能的。

至于丘吉尔，他对德黑兰会晤的反应比较审慎。当然，总的说来他对这次会晤也作了肯定的评价。莫斯科1944年1月24日收到的英国首相致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从德黑兰带回的对我们的良好关系的感受使我非常振奋。”

丘吉尔持审慎态度是事出有因的。在德黑兰讨论许多问题时，他都处于少数地位。他步步为营，渐渐退却，最后被迫勉强同意苏联和美国所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协议。

把德黑兰会议看作反希特勒同盟的鼎盛时期是理所当然的。它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这一相当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巩固了三大国的团结；确定了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日期；同时还就战后安排与和平条件下的合作等许多问题通过了决议。苏、美、英三国最高领导人的个人会晤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反希特勒同盟三个主要大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还暴露了由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世界观和思想体系的国家组成的军事同盟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和矛盾。

当时，苏联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尽快消灭法西斯，为持久和平和全世界各民族的独立发展创造条件。而反希特勒同盟的西方参加国则在致力于歼灭共同敌人的同时，还追求另外一些颇为特殊的目的。决定华盛顿政策的因素是竭力确立美国在世界的统治地位，并竭力把美国的影响扩展到衰落的英国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地区。而英国统治集团所担忧的首先就是：尽管困难重重，仍要设法保住大英帝国的地盘。因此，伦敦力图阻挠苏联同美国接近。因为英国一贯认为，最有利的形势应是：英国能够在两股强大势力之间搞平衡，利用矛盾，从中渔利。

不言而喻，上述情况必然在会议中有所反映。例如，讨论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时，丘吉尔直到最后一刻仍然企图摆脱承担任何具体义务，尤其是拒绝确定英美联军在法国北部登陆的确切日期。他企图继续拖延时间，指望苏联在同希特勒德国一对一地浴血奋战中被削弱，从而使英国在战后的欧洲起主导作用。罗斯福

当时在第二战场问题上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英国首相3年中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在1941和1942两年中，甚至直到1943年11月，罗斯福总统不止一次地迁就丘吉尔的掣肘行为，结果诺曼底的登陆一拖再拖，而西方盟国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多次许诺屡屡不能兑现。但是，罗斯福关于把同苏联的合作扩展到战后时期的构想在原则上并不排除确定尽早登陆的日期。最后，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认为必须确定开辟第二战场的确切日期，后来也就不顾丘吉尔的反对这样做了。

讨论波兰命运问题时，英国首相也处于孤立地位。美国代表团团长对于苏联希望在自己的西部边界有一个强大、民主、友好的波兰这一愿望，总起来说是抱谅解态度的。他认为，波兰政府若能努力与苏联保持友好睦邻关系，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由那些极其敌视苏联的人物组成，——这将是无可指责的。但丘吉尔一直散布在苏联周围建立一条由敌视苏联的国家组成的所谓“防疫线”的妄想。协约国为了达到孤立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目的，曾在二十年代初期建立过这种“防疫线”。丘吉尔竭力想把那些躲在伦敦组成所谓“流亡政府”的反动政客当中的某些人强加给波兰人民，作他们的领导人。英国外交在这方面也未能达到目的。

罗斯福同斯大林就欧洲列强殖民地的前途，特别是印度支那和印度的前途交换了意见，这也使丘吉尔惶惑不安。这次交换意见是罗斯福倡议的，是在没有英国首相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证明美国人试图背着英国同行在这方面进行试探。华盛顿显然打算排挤英国和其他宗主国，使殖民地对美国开放，听任其通过“托管”方式进行渗透。丘吉尔无疑获悉了关于美国这种试探的情报，认为在这一对于大英帝国利益如此敏感的问题上自己受了委屈。

所有上述因素，加之罗斯福对斯大林所显示的某种个人好感，使丘吉尔张慌失措，他担心这种趋势可能给英帝国带来某些后果。他想到苏联同美国的接近以及美苏可能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达成

协议，心中尤为不安。丘吉尔想，苏联尽管遭受了重大损失与破坏，但仍可以经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并与美国平起平坐，他真害怕遭到很大削弱的英国将退居次要地位。这位保守党领袖认定，欲使英国作为世界大国复兴起来，只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苏美之间的分歧。因此，他的主要心思都用在如何防止苏美在战后继续合作上面。这就必然决定了丘吉尔的行为总是旨在扩大苏美立场的分歧，不断挑动苏美之间的相互猜疑，甚至尽量唆使苏美双方冲突起来。

在分析反希特勒同盟内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该同盟三大国领导人第一次会晤之后所形成的局势特点。

本书中，作者不打算全面阐述从德黑兰会议到波茨坦会议这一历史阶段中军事、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风云变幻与错综复杂，而是给自己提出了较为局限的任务：记述某些场面与事件，尤其是作者曾身临其境的、对于反法西斯同盟参加国之间相互关系具有特殊意义的场面与事件，并向读者介绍，导致战时同盟最终破裂的严重矛盾是怎样逐渐酿成的。

第二章 贯彻德黑兰决议

重返莫斯科

从德黑兰返回后，我们很快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节奏。作为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参赞，我和B·H·巴甫洛夫得到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它座落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秘书处的旁边。要去这间办公室，需穿过一段走廊，走廊高大的窗户外是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内院，院中堆满积雪。刚刚离却伊朗深秋那种介于黄绿之间的色调，这小院里的白雪显得格外明亮耀眼。这个院落如此之小，我们甚至透过对面的同样高大的窗户可以看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里那些俯身于军用地图的军官们。前线战事进展顺利，大家怀着好感、好奇心和羡慕之情望着大本营的军官们。

我们的房间里有两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个书架和两个革命前的、莫斯科工匠制作的大保险柜。当时，任何人家中都不准藏有收音机。战争开始，大家都把收音机上交到有关邮局保存，等战争结束后再领回。由于我们工作需要收音机，巴甫洛夫经交涉之后谈妥：把他1940年底从柏林带回的那架“捷列芬肯”牌收音机保存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如今这台收音机就放在克里姆林宫内我们的办公室里，我们收听“BBC”电台的广播，可以更多地积累英语成语和政治术语。此外，巴甫洛夫还搬来了两本厚厚的韦氏大词典，一有闲暇我们就钻研它，以便扩大词汇量。中午1点钟左右，我们到旁边那座大楼的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的学员食堂去吃热馅饼、喝茶（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这座楼办公）。

当时我们还听德国的广播。希特勒匪徒在战场上的状况越来越不景气，但戈培尔的宣传机器仍如当初那样大吹大擂。不过，

根据元首的广播来判断，纳粹最高层的不安情绪一天比一天明显。元首越来越歇斯底里了。

我们的工作一般从上午10点钟开始，深夜才结束，下班的早晚根据莫洛托夫回家的时间而定。通常是晚上5点至7点吃晚饭和休息，但我俩当中的一个人要轮流一直坚守岗位，因为随时都可能预想不到的事情。

我仍然负责美国处的工作，因而同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会美国司司长查拉普金打交道较多。巴甫洛夫和以前一样，负责研究苏英关系。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除主管其他司之外也主管美国处和英国处。从他那里呈报给外交人民委员的有关美国和英国事务的文件，通常都由我们经手，我们有责任使这些文件写得合乎要求，附上必要的参考资料和其他有关文献，供莫洛托夫在决定问题时或就事关重大的问题向斯大林报告情况进行查阅。此外，当时苏联政府首脑最为重视的就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因此所有牵涉这两个国家的稍微重要一点的文件都需呈报给他备查。

一般说来，通过外交人民委员呈报给斯大林签署的文件，批转回来时没有什么改动。只是左上角有大家熟悉的、他用蓝色铅笔写上的名字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约·维。但也常有这种情况：文中有改动，有批语，有时在打字稿的上方还写有批示，指出应当怎样重写这一文件。

我们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的工作是：把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发给斯大林亲收的信函赶快翻译成俄文，同样，也要把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给外交人民委员亲收的信件、文件、照会、备忘录翻译成俄文。有时，这些文件已由使馆译成俄文，但多数情况是英文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总是立刻将信函译成俄文，然后分发给受信人。苏联领导人的回复信函是俄文文本，但在某些特别关键的或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也提供非正式译文，以便盟国大使及时了解回信内容。

有时函件中附有某大使的短信。美国大使哈里曼发来的这种信用的是使馆的一般信纸，打字稿。但英国大使——尚保持着旧式外交家风度的克尔先生以及后来的英弗查佩尔勋爵——发来的这种信是用蓝色的信纸、鹅毛蘸水笔手写的，字迹有洇糊的地方。这样，巴甫洛夫就得花不少气力猜测手稿中的字。

除此以外，我们还为外交人民委员同大使以及其他来访贵宾作翻译，同时还要给苏联政府首脑作译员。同英国人会晤，一般都叫巴甫洛夫去；接见美国人，则叫我去。我们还要整理谈话记录，并拟出发给苏联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的谈话纪要的电文稿。外交人民委员有时还派我们去有关使馆办理某些事务。

在阿弗里尔·哈里曼的官邸

从德黑兰回来不久，我肩负着一个非同寻常的使命拜访了哈里曼大使。

在德黑兰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过生日那天，斯大林送给他一件以俄罗斯童话为题材的瓷塑。罗斯福见了非常喜欢。看样子，斯大林当时就决定也送些类似礼物给美国总统。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委托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会长B·C·克 缅诺夫和造型艺术行家选几件合适的礼品，这些礼品曾拿到克里姆林宫请斯大林过目。最后选中了一套相当大的群塑。这套彩色瓷器的鲜艳格调使人想起俄罗斯帕列赫能工巧匠的作品。斯大林还吩咐复制他的著名的衔着烟斗的照片，并在照片上写下赠礼题词：“赠给我的战友——美国总统罗斯福”。我要把这些礼品——瓷塑和照片——转交给哈里曼大使，以便运往华盛顿。

我先通过电话联系，然后在约定时间来到座落在阿尔巴特区的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厦”。用硬纸箱包装好的瓷塑，安安稳稳地放在宽敞的“吉斯—101”汽车后排座位上。我和司机小心翼翼地把它搬出汽车，抬到这座官邸的会客室里。看门人打开大门

后，拿起卷在褐色硬纸中的相片，跟在我们后面走进来。过了一会，哈里曼下楼向我走来。他想看一看礼物，于是我同他一道打开了包装箱。大使看过瓷塑，赞叹不已，并建议庆祝一下此事。一个端着托盘的中国仆人立刻出现在眼前，送来了带冰块威士忌。我们坐到客厅半圆形部分的矮桌旁的软椅上。窗外是覆盖着白雪的草地。哈里曼仔细地端详着照片（我立即把题词翻译给他听），并说，收到这些礼品，总统会欣喜异常的。他请我向斯大林元帅转达衷心的谢意，感谢斯大林所表示的这种友好感情，感谢斯大林对总统在德黑兰赞赏当时送给丘吉尔的礼物作出如此慷慨的反应。

接着，哈里曼开始谈起，他认为不久前斯大林元帅同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会晤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他说：

“我相信，在德黑兰所通过的决议将不仅有助于战事的顺利进行，而且会对我们两国的战后合作产生有利的影响。”

不久，罗斯福发来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对斯大林所赠礼物表示感谢。同时，美国总统给苏联政府首脑送来了自己的、镶着精致金属框的照片，上面有他的赠与签名。

毋庸置疑，哈里曼在战争年代以及战后时期，在发展苏美关系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他始终不渝地主张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主张加强联系。在我国，凡了解他的人一直给他应有的评价。哈里曼在美国也享有同样的声望。与此同时，在把哈里曼看作是一贯致力于苏美和平对话的人的时候，不能忽略的是：他是美国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坚定的拥护者，他也不隐讳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反感。须知他本人出生于富豪之家，是个一向政绩卓著、家资不断扩展的实业家。他之所以从前和现在都主张发展同苏联的正常关系，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方针合乎他本国的利益。然而，与此同时他把“为国家效劳”，即为他自己也身属其中的美国上流社会效劳，视为就是赴汤蹈火也须完成的社会义务。

最近出版了他的一本书——《特使——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周

旋记(1941—1946年)》。书中有一章叫做“成器扬名”的道路。哈里曼写下这样一段回忆。他最早是共和党员，在1928年转向了民主党。1933年，正值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弗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哈里曼对“新政”改革发生了兴趣，并开始积极支持这一改革。哈里曼回忆道：“华尔街大老板（其实他也是这些老板之一）一般地对罗斯福试图去做的一切事情几乎都是极力反对的，甚至不愿南下到华盛顿同政府就复兴措施进行磋商。我不能理解他们的态度：须知国家正陷于可怕的境地呀。”为此，他受到实业界同人的排斥。哈里曼承认：“当我走过华尔街，我有生以来所认识的人都穿过街走向另一边，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同我握手了。”

还有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1946年，哈里曼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当时华盛顿的杜鲁门政府已确定改变同苏联合作的政策，开始实行“冷战”方针。贸易部长亨利·华莱士（罗斯福任总统时，他是美国副总统）公开反对这种倾向。杜鲁门解除了华莱士的职务并往伦敦打电话，建议哈里曼回来接替这个刚刚空出来的部长职位。正如哈里曼自己所说的那样，他“高兴地”接受了杜鲁门的建议。这件事突出反映了哈里曼的政治观念：虽然他不是所有时候和在所有的问题上赞同华盛顿行政当局的某些具体措施，但只要民主党人还在白宫执政，他并不想同当局分道扬镳。

后来，我曾多次有机会与哈里曼会晤。每逢去华盛顿，为了进行有趣而且有益的交谈，我总要到座落在乔治顿的一座别墅去。这座别墅用红砖砌就，有一扇高高的雪白大门，门上装有耀眼的铜把手。这别墅就是这位年高望重的外交官在华盛顿的宅邸。别墅被绿荫覆盖的花园围绕，经过一层层坪台向下走去，便是游泳池。在游泳池旁碧绿如茵的草地上，我不止一次地同哈里曼一起坐在藤椅里谈论遥远的过去、当今的事态和未来的远景。谈及自己对于苏美关系问题的原则立场时，哈里曼有这样一段表述：

“回顾近 50 年来同苏联交往的经验，我发现，虽然形势发

生了剧烈的变迁，但我的基本观点改变极少。我象在1945年时一样，依然坚持这样的意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克里姆林宫同我们将不会相互妥协。但是，我们应当找到解决尽可能多的冲突形势的途径，以便能够不发生战争，一起生活在这小小的地球上……”

我认为，作这样一个简短的插叙是重要的，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插叙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哈里曼在本书谈及的那些年代所起的作用。我们在了解哈里曼的实际活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事件的具体事态的评价时，不能不考虑到他作为对本阶级利益、对美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的信念以及他对上述利益的理解。

同时，哈里曼是许多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的见证，特别是有关苏美关系的部分，令人颇感兴味。很长时期以来，哈里曼对我国就十分关注。1899年，哈里曼的父母在一次长途旅行时带着这个8岁的孩子来到俄国，这是他初登俄国的土地。当时，哈里曼一家在白令海峡西岸上陆，停留的时间不太长。后来，有一次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谈及这次旅行时补充说，那时他们一家3人谁都没有护照签证。斯大林插话说：

“若是现在，你们就进不来了……”

十月革命后，哈里曼决定同苏俄建立商业联系。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哈里曼一家在高加索第比利斯附近的恰图拉取得了“格鲁吉亚锰公司”的租让权，这样，哈里曼多次来到莫斯科、高加索联系租让企业有关事宜，会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

哈里曼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对于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斯大林的评价是耐人寻味的。自然，只要有机会，哈里曼是不会放过强调斯大林性格中某些人所共知的消极面的。但与此同时，他承认斯大林的“高超才智，那种不可思议的掌握细节的能力，他的机灵和在人情方面惊人的敏感……我发现他比罗斯福知道的事情多，比丘吉尔更现实得多，在某些方面他是最有效能的战争领导者”。

艾森豪威尔出任总司令

早在1943年12月，盟国就采取了某些实际步骤贯彻德黑兰决议。

12月7日，哈里曼拜会莫洛托夫，转交了罗斯福总统的紧急信件。陪同哈里曼的是翻译查尔斯·波伦，我当时是苏联方面的译员。总统的电报很短，但包含着重要的内容。电报中说，“已经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强渡海峡作战的总司令。”

美国人有一种印象，认为莫斯科比较希望马歇尔将军出任此职，斯大林与马歇尔有过个人交往。因此，大使特别希望尽快知道斯大林的反应。当莫洛托夫读电报时，哈里曼问道：

“什么时候才能得知斯大林元帅对此事的看法？”

“我现在就和他通电话。”莫洛托夫即刻回答。

他从我们大家围坐的长条桌旁站起，走到电话桌旁，在绿色的电话机前略微站了一会儿，便拨动直通斯大林办公室的电话。

“没……没有打断您的工作吧？”平时他一激动就有些口吃，这时就口吃得更厉害了。虽然他们两个人亲密相识已有几十年了，但同斯大林谈话总是使他激动不安。“哈里曼先生此刻在我这里。他带来了总统给您的信件。在法国北部登陆战役的总司令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

他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听着斯大林说话。

“明白了。”莫洛托夫说。他稍等了一下，直到听到电话那端挂断的声音，才小心翼翼地放下听筒，回到长条桌旁。他对美国大使说：

“斯大林元帅对这项决定表示满意。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位有经验的将军，他尤其熟知指挥大兵团登陆战役的诸项问题。”

哈里曼听了很满意。看来，他很愿意来通知任命总司令的事。过去，这项任命一拖再拖，今天终于决定下来了。这证明西方盟

国严肃对待有关开辟第二战场方面的各项计划。

在德黑兰讨论这一问题时，英国和美国代表申明，登陆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速进行。斯大林出其不意地问道，是否已经任命了这次战役的总司令？原来，还没有任命。

“这样看来，”斯大林指出，“‘霸王’战役将会落空。”

这个意见不啻是一把利刃，把整个问题戳穿。非常清楚：既然连总司令还没有，西方盟国关于他们准备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声明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在德黑兰，这一问题就这样悬而未决。但罗斯福和丘吉尔答应尽快任命称职的指挥官。如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这一任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此后的官运，为他后来进入白宫开辟了道路。

12月7日，克里姆林宫还收到一封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的密电。它涉及到英美在西欧的军事行动以及与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其他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有关的一系列措施。电报中说，为了破坏德国军事、经济和工业体系，摧毁德国空军的战斗力并为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铺平道路，从战略上看，用轰炸机攻击德国将成为首要任务。电报接着指出，根据德黑兰协议，已经缩小了原定于3月份在孟加拉湾作战的规模，以便有可能增加进攻法国北部用的登陆工具。此外还通知说，为了加强即将到来的战役，打算在美国和英国扩大登陆艇的生产。

苏联方面对这一通知表示感谢。斯大林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他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任命表示欢迎并祝愿这位将军“在准备和执行未来的决定性战役方面获得成功”。

这样，西方盟国终于郑重其事地开始准备攻占法国北部了。

苏联则以战场上的实际行动为贯彻德黑兰决议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尽管希特勒匪徒激烈抵抗，苏联军队仍然勇往直前地向西推进，把侵略者从越来越多的地域上驱赶出去，以不可阻挡之势一步步接近我们祖国的边境线。乌克兰和西北诸战场的军事行